

编辑手记

诗词,积淀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意趣、精神风骨与文化根脉。本期特邀凤凰出版社编辑,围绕两部与诗词有关的作品展开分享。《花间集注评》立足南宋古本,承续前人治学脉络,以严谨注释与精妙评析,还原花间词的艺术神韵,为词学研读与大众赏读提供优质文本;《诗写万灵:动物千年陪伴史》以十二种动物为切入点,挖掘诗词中的文化意象与民族记忆,用生动笔触解读万物有灵的东方哲思。两本书一深一广,各有侧重、相得益彰,充分展示出古典诗词跨越时光的永恒魅力。

——编者

“花草情思”的千年回响

□黄如嘉



《花间集注评》,高峰注评,凤凰出版社,2026年1月

责编一本书,如同跨越时空,陪伴作者走过一段创作历程。在编校《花间集》这部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总集时,细读五百首词作不难发现,其中花的意象出现两百余处、鸟的意象出现三百余处,几乎无篇不涉花、无句不映鸟。注评者——南京师范大学高峰教授没有做空泛的赏析,他从原词文本出发,集多年研究心得,将花鸟意象放回具体语境之中,字字有依据、句句有来历。我在编辑过程中,也尽力守护这份严谨与真切,力求让读者读到有据可依的注解、优美动人的评析。

花间之花,各有心事。杏花最是常见,也最是动人的。温庭筠“杏花含露团香雪”,写尽初绽的洁净温柔;韦庄“杏花吹满头”,是青春烂漫,也藏着别后的怅然。高峰教授点破杏花由红转白、自盛而落,恰如闺中人情思起伏、青春易逝——花间之花从来不是点缀,而是情绪的外化。牡丹花开映照着闺阁的华贵,落地便见见人心孤寂;荷花清丽,皇甫松“菡萏香连十顷波”,为浓艳词风添一抹澄澈沉静;丁香含结,毛文锡“豆蔻花繁烟艳深,丁香结同心”,暗写相思缠绕、欲说还休;“海棠未坼”,藏着幽情欲语还休的怯意;还有梨花胜雪,温庭筠“满宫明月梨花白”,清寂之中尽是怀远之情;红蓼映秋,薛昭蕴“红蓼渡头秋正雨”,点染出一派凉雨送客的苍茫。高峰教授不贴标签,不做过度引申,只依词句解意,我在校对时逐句核对,确保每一处注释都贴着原文走。

花间之鸟,声声含情。鹧鸪是花间词中绕不开的意象。“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以成双纹样反衬孤身寂寞,鸣声恰似“行不得也哥哥”,道尽离别之难;温庭筠“燕归君不归”,魏承班“寂寂画堂梁上燕”,李珣“隔帘微雨双飞燕”,皆以燕之相伴写人之孤独,乐景衬哀情;子规啼

血,温庭筠“花落后规啼”,一声声啼鸣,更添离愁之苦;黄莺啼晓,“细雨晓莺春晚”“绿槐荫里黄莺语”,清啼惊梦,醒一枕缠绵相思;青鸟传信,牛峤“青鸟传心事”,衔来幽情,寄往天涯;鸿雁南飞,张泌“鱼雁疏,芳信断”,温庭筠“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托鸿寄书,却总被关山相隔;还有鸳鸯独立、鸚鵡孤栖,或清寂、或恩爱、

或孤单,皆随语境而出,随心境而鸣。

打磨文稿的同时,在设计层面,必须让整部书的样貌配得上“花间”二字。函套设计几经调整,最终采用激光雕刻镂空花窗,线条婉转、意境空灵,取“绮窗庭院、花影窥人”的中式审美。深红色函套隐隐透出封面的素雅洁白,不张扬、不堆砌,一眼望去,便有晚唐五代绮丽温婉的质感。内文采用全彩印刷,字大行疏,宁可用多篇幅,也要让阅读舒展从容,使当下读者能静静欣赏品读。更重要的是,我们精选百余幅历代花鸟古画随文排布,每隔十余页文字便有画作相配,让词、注、画三者相融相生。读一句词,看一幅画,品一段评,让阅读节奏更显悠闲。此外,我们希望阅读不止于“看”,更能触摸到花间之美,因此特别附上一套八张仿古花笺,以婉约花鸟为底纹,纸色温润、纹样雅致。这不仅是点缀,更是阅读的延伸——愿读者合卷之后,能提笔抄一句心动之词,写一段片刻心绪,让千年不谢的花间风雅,不只停留在纸上,更能落在指尖、留在心上,并以此为契机扩大与读者的互动,提升线上线上传播声量。从函套花窗到内文图画,从版式节奏到花笺书写,一切设计都围绕“花间”二字,只为让这本书由内而外,宛若从《花间集注评》中自然生长而成。

花间词动人之处不在辞藻绮丽,而在乱世无处安放的心绪,皆托付于一花一鸟。这部注评,便是把千年隐秘的心事,轻轻交付给如今的读者。作为编辑,我逐首校勘五百首词,确保注释不违原典;梳理花鸟意象脉络,让解读有根有据、不散不乱;再从版式、配图到装帧细节精心选材、反复打磨,让全书气质浑然一体。高峰教授以学者的沉潜,读出五代词人的心事与寄托;我以编辑的用心,让这些精微的解读,平顺抵达今天的读者面前。

万物入诗皆文化

□杜锦瑞

《诗写万灵:动物千年陪伴史》由学者史双元创作,是一部讲述中国诗词与动物文化的原创作品。书中遴选灵猫、家犬、神龙、金蚕等十二种与中国、中国古典诗词深度联结的现实动物与神话意象,梳理其在历代诗词中的形象演变,解读它们被赋予的文化内涵,由此呈现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该书的选题灵感,源自一则引发广泛热议的新闻:一头待宰的耕牛眼含泪水,瞬间触动无数网友的心。那一刻,人们真切体会到何为“万物有灵”。中国人从未疏离过动物,总会因生灵而动情,这是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千年传统。早在古代,便已有无数诗人,为这样一双“含泪的牛眼”写下动人篇章。策划之初,编辑部便将核心关键词定为“动物”与“诗词”,但并未沿用近年流行的博物学写作路径,而是挖掘动物背后的文化故事,突出其文化属性,以及动物对中国人的“陪伴”意义。

鸟兽虫鱼,万物有灵。地球诞生46亿年,人类作为已知唯一的高等智慧生物,一路走来并不孤独。在漫长岁月里,经由中国人浪漫的想法与生活智慧,相伴左右的动物们逐渐被赋予丰富而温暖的文化内涵:狗象征忠诚,猫代表机敏,牛寓意淳朴,马彰显昂扬。每一种动物都被赋予独特的灵魂,而这一点,在古典诗词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千百年来,中国人接续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动物形象,这些形象的拟人化特质,在诗人笔下被发挥到了极致。在抒情写意的诗词中,我们既能读到“我与狸狌不出门”里猫咪的慵懒温顺,也能感受到“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中老犬久别重逢的依恋忠诚,更能体会“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所写骏马承载的少年意气。这其实正是王国维所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生动写照。许多动物在诗词中形成了专属的文化意象。

该书开卷写猫,轻松闲适的隐居意趣扑面而来;写到蛇,则多是处境艰险,心境沉郁,难有欢颜。读到马,便知多在抒写人生际遇、建功立志——“春风得意马蹄疾”是意气风发,“古道西风瘦马”是孤寂苍凉,写的是马,更是人。读到牛,田园诗的泥土芬芳便萦绕心间,宠辱得失皆放下,眼前唯有青青田野、淳朴乡野。而同属家

畜,驴一出现,常带着文人落魄清苦的意味,细品之下,那青驴又往往暗含几分隐逸仙气……书中选取的这十二种动物,都是与中国人的生活最贴近、情感最深厚的伙伴。我们希望借此解答:为何诗人常用它们描摹心境、寄托情怀?它们为何在诗词中呈现出这般固定面貌?答案,最应当到诗歌中去寻找。因此,讲述诗人笔下的动物故事,实则是讲述历代诗人的心灵轨迹,品读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色。

十二种动物各自代表的中国文化切面逐渐清晰,其背后的文化故事也徐徐展开。“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灵猫是古代市民阶层养宠文化的生动代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家犬是比灵猫更贴近人心的忠诚护卫,在诗词中始终象征着对家园的眷恋与守候。“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螃蟹走上餐桌的历程,正是中国人追求美食意境的典型写照——不只品其滋味,更将饮食升华为艺术与文化,金蚕也因此成为美食文化的鲜明符号。神龙自不必多说,作为十二种动物中唯一的幻想生灵,“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它的形象成型与演变,本质上是中华民族信仰不断融合汇聚的过程。“八骏日行三万里”,天马在诗词中往往象征着对功业的追求,上可映照帝王鸿图,下可寄托文人士志的报国理想。

从太阳神鸟沦为“乌夜啼”意象的金乌,见证了神话中动物崇拜的典型转变:由神圣降至凡俗,变的从来不是动物本身,而是中国人对美好与吉祥的定义。与相伴的玉兔,因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跻身月宫,为仙鹤药,成为长生神话的象征。“月中辛勤莫捣药”,诗人吟咏月中仙子时,总不会忘记那只柔弱的白兔,内里藏着国人对弱者的真诚怜悯与美好祝福。与之相反,长蛇曾对古人造成严重的生命威胁,“朝避猛虎,夕避长蛇”,许多诗人笔下都流露出对它的畏惧。中国人对这一图腾的崇拜与认知史,亦是一部与自然抗争、求得生存的历史。

猿猴的形象则更富意趣:诗词中的猿多哀伤,猴却常带着喜悦与滑稽,一悲一喜之间,人类对自我的情感映射呼之欲出。“细雨骑驴入剑门”,中国文人为何偏爱以蹉跎作为落寞失意的自我象征?得意骑马,失意骑驴,这段故事安妥



《诗写万灵:动物千年陪伴史》,史双元著,凤凰出版社,2025年9月

的不只是历代文人的孤寂诗心,也同样能宽慰在现代社会中前行的人们。驴的身旁是耕牛,它默默承担起数千年的农业文明。诗词中对牛的书写与眷恋,正是扎根于黄土地的中国人对远去田园与故乡的永恒回望。同为家畜,羊何以能位列生肖?很多人未曾留意,羊身上有着中国人极为推崇的品格——节义。从吉祥羊身上,我们可窥见中华民族千年不变的精神坚守。

这是一本以内容为核心优势的读物。编辑部将大半心力投入前期策划与文本打磨,在后期呈现上,也选择了最能凸显文字价值的设计思路,从内文版式到封面装帧,第一要义都是服务阅读、回归阅读本身。沉下心打磨这样一部纯粹的原创作品,脚踏实地做内容,对作者、编辑与出版社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我们始终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饱含温度的文字,终将抵达那些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读者手中。

唐代藩镇问题,自安史之乱后延续至唐末,持续150余年,深刻影响了唐朝的政治结构、军事制度与社会经济。它既是唐王朝历史演变的关键节点,也是理解中国中古社会向近世转型的重要镜像。《藩镇与唐代政治》一书,正是对这段复杂历史的系统梳理。作者孟彦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凭借30余年的学术积淀,他将“藩镇”这一现象层层“拆开”,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清晰而立体的唐代政治图景。该书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与严密的逻辑分析,探讨了唐代藩镇的起源、演变、性质变迁,勾勒出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宪宗元和末年,李唐王朝从动荡走向秩序恢复的历史进程。

作者认为,藩镇问题的本质在于“控制”,其根源则是军队性质的转变。该书一开篇便从兵制演变入手,提出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在边防压力下逐渐被节度使兵制取代,军队从“兵民合一”的预备役转变为职业化的常备兵。随着军人家属随军、驻地固定,军队出现了“地著化”倾向,为后来的军队地方化埋下了伏笔。安史之乱加速了这一趋势。战乱期间,中央为平叛不得不大量组建地方军队,并默许其自筹军费,这使得军队从“中央军”彻底沦为“地方军”。作者提出“军队地方化”这一核心概念,认为在此过程中,军人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形成“地方军人集团”。他们不仅干预地方政治,甚至掌控节度使的废立,追求建立“军政府”或“军人政治”——这正是唐后期藩镇跋扈乃至割据的社会基础。

该书以新的历史分期视角,揭示了唐后期政治的动态变化:安史之乱后的动荡并非一成不变的泥潭,而是经历了从崩坏到重建的历程。代宗在战乱之后基本稳定了局面;德宗经过建中年间的用兵,控制了山南东道,易定、沧景两镇从成德脱离出来,基本形成了既能护卫运河、又能遏制淮西的藩镇格局;到了宪宗,终于彻底平定淮西与淄青。这个过程,也是朝廷逐渐形成明确藩镇政策的过程,可谓“秩序恢复的六十年”。此后,朝廷虽未能收复河朔三镇,但对中原、东南地区大部分藩镇的控制日益稳固,这一稳定局面持续了近60年,直到黄巢之变才被打破。这种分期将唐代后期政治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动荡、重建、稳定,使藩镇问题真正成为理解唐王朝衰落与转型的钥匙,而非一个孤立的负面符号。

作者通过“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等核心概念,为藩镇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军队地方化之后,产生了以牙兵为代表的地方军人集团,形成了“中央—节帅—地方军人集团”三方相互矛盾、相互牵制的复杂局面,这深刻制约着朝廷与藩镇的关系。三方彼此依存又彼此制约,这一核心关系为我们理解藩镇内部动荡与中央控制策略提供了关键切入点。地方军人集团与中央争夺对地方的控制权,是藩镇游离于中央乃至公开对抗的根本原因。这一视角将制度史(兵制演变)与社会史(军人集团形成)结合起来,深化了对唐代政治变迁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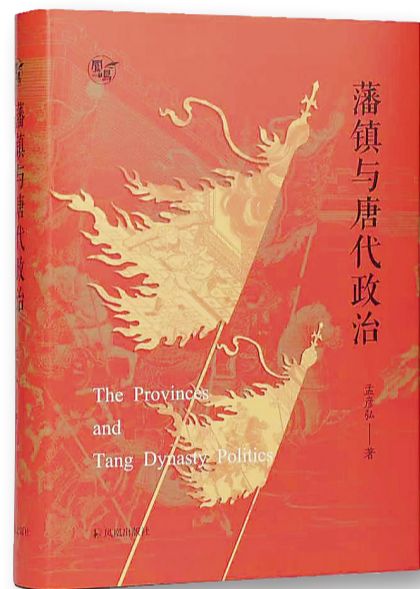
作者还在书中首次系统总结并论证了唐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藩镇控制策略。这一概括并非简单描述,而是通过对代、德、宪三朝政治实践的细致梳理,揭示出朝廷对藩镇问题认识的逐步变化。朝廷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清晰的藩镇政策。代宗朝的“姑息”是大乱之后稳定局面的不得已之举;德宗即位后试图以武力彻底解决河北问题,但建中用兵的失败使朝廷不得不正视现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国策逐渐形成,成为朝廷处理藩镇问题的理性选择。宪宗朝的用兵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在平定四川刘辟、镇海李錡之后,朝廷没有乘胜进攻河北,而是专力对付淮西与淄青,最终实现了对河北以外藩镇的全面控制。该书对唐廷藩镇控制策略的概括与揭示,为此后的藩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唐亡于藩镇”的传统说法,该书提出了审慎反思。作者认为,唐末的崩溃是由黄巢起义引发的全局性动荡,彼时河朔三镇自顾不暇,已无“亡唐”之力。唐王朝的灭亡,更主要源于其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在战乱中彻底瓦解,而非藩镇问题长期累积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有助于跳出因果决定论的窠臼,从更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审视王朝兴衰。

超越藩镇,重识大唐。《藩镇与唐代政治》不仅是一部关于唐代藩镇的专门研究,也体现了对唐后期政治史研究范式的反思与突破,其学术影响与启示意义已超越藩镇问题本身。透过藩镇这一窗口,该书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大唐帝国在经历历史之乱的毁灭性打击后,如何艰难地从动荡走向稳定,如何在军队性质根本转变的背景下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它告诉我们,要读懂大唐,不能只盯着长安的宫阙与朝堂上的君臣,还要走入那些被视为“割据”的藩镇,去观察地方社会的实际运作——在那里,朝廷与藩镇的博弈、帝国的动荡与重组,往往比

超越藩镇 重识大唐

□张永莹



《藩镇与唐代政治》,孟彦弘著,凤凰出版社,2025年8月

朝堂故事更加真实复杂。

该书最突出的方法论启示,在于其鲜明的“过程史”研究路径。作者在引言中坦言,他的目标不是挖掘新史料,而是追问“从哪个角度、用什么事例或史事,用什么逻辑、怎样勾勒线索,如何进行解说”。换言之,他不满足于呈现“发生了什么”,而是追问“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产生了哪些后果”。以“军队地方化”为例,作者不仅指出安史之乱后军队性质的变化,还细致勾勒了其制度轨迹:从府兵制崩溃到节度使兵制确立,从士兵终身化到家口随军,从地著倾向到地著化,从“食出界粮”的出现到军政合一的最终建立。每一步变化的累积,导致了始料未及的结构性后果:军队变成由当地人组成、由当地赋税供养的地方军,地方军人集团由此形成。这种“过程史”的研究路径启示我们,理解历史不能只看结果,更要追踪过程。

该书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启示,在于它始终坚持“贴着史事走”的研究态度。作者在书中坦言:“我只能‘贴着史事走’,就事说事;所作的解释,也多是针对具体的事,是‘事中求理’。”这种看似朴素的表述,实则包含着深刻的学术自觉——拒绝空泛议论,拒绝理论先行,一切论述都建立在史实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这一态度的直接体现,便是全书对史料处理的审慎与精当。作者在引用《资治通鉴》时,往往同时参照《唐书》的列传、墓志材料以及《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对史事的系年与细节反复核校。同时,作者对史料的性质保持高度警觉,例如,认为碑志、行状等传记资料的目的并非“撰史”,其所记事件的系年往往不够详细可靠,因此在引用时特别注意与《资治通鉴》等编年史书相互印证。正是这种对史料的敬畏与精准把握,使该书的论述既有坚实的史实支撑,又有清晰的问题意识。

总之,该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底和清晰的理论框架,为唐代藩镇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对于研究者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参考;对于希望深入了解唐代政治史的普通读者,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解视角,可谓开卷有益。

(作者系书评人)



凤凰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